

武昌首義五大檢討

(上)

蔣君章

今年十月十日是武昌首義第七十二次的紀念節。這是我國劃時代的節日，值得永久而熱烈的慶祝。在我們反攻復國從醞釀轉變到實施階段的八十年代，紀念雙十武昌首義，意義格外重大。

二十一年前，為了紀念中華民國開國五十週年，作者曾主編過五十年開國文獻，因此對武昌起義、民國建造、國父孫中山先生讓國、袁世凱竊國等資料，接觸面相當廣。



武昌首義獲利最多的袁世凱，清廷利用以漢制漢政策起用他對付革命軍，圖為袁世凱任湖廣總督時的照相。

為了適應當前國家反攻復國的需要，本文擬提出下列問題的檢討。

我的問題是武昌首義，為什麼能够一舉成功？

武昌首義的成功是表面的，中華民國的體制是成立了，但是真正的成功者是黎元洪與袁世凱。

在武昌首義之前，反清革命的起義，已有十次，但其起義地點，大多數都在南方的邊區。無可諱言的這十次起義，都告失敗，只在十一次的武昌首義，才一舉成功，其難能可貴，即在於此，這是公認的史實。因此，武昌起義的成功，當與起義地點有密切關係，我們首先要研究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同盟會成立以後，革命同志們對於起義地區，本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起義地區優劣之辨

美而毫無瑕疵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成功之處，我們應加採用，並予以擴大；其瑕疵之處，我們應予改進，才對我們反攻復國運動有重大的參考意義。這是作者撰擬本文的原意，還請大雅方家，不吝賜教。



(上圖) 回籍養病時的袁世凱，披戴笠，在滬上垂釣圖。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出賣光緒，宣統繼位後攝政王載灃罷免袁的官職，命他回籍療養足疾，袁在家鄉自號滬上釣叟，撐篙者是他的弟弟。

(下圖) 武昌首義革命軍發炮後，由督署後門逃出城外的湖廣總督瑞澂。

其一，是北方起義論，就是在以清廷政治中樞的「北京」為策動的中心地區，這是「擒賊先擒王」的主張，自然是有極深的意義，是推翻滿清政府的捷徑。

但是這一主張的最大問題，是北京能有展開革命運動的可能嗎？清代嘉慶年間，天理教的北京起義之失敗，是一個顯明的例子。當時天理教的首領，為了執行此一計畫，特別淨身為太監，

混入清政府的宮廷，準備一舉而推倒其統治的腦部，其用意不可謂不深，但是既然要做這樣的大事，必然要有許多活動，消息難免於外洩。因此，不久即被發現，天理教反被摧毀，以後便消聲匿跡，未聞更有活動。

不錯，這是最便捷的途徑，但也是最危險的途徑。凡參加北京城內作革命運動的同志無不發覺戒備森嚴，難於着手，不得已而退以天津為中

心，延及山東與東北，逐漸演變而以個人為中心的暗殺運動，這一運動對革命的貢獻，雖然也極大，但與原有宗旨相去太遠了。

其二，是中部革命的主張，中部即指長江流域，這是我國經濟的心臟地區，交通便利，且各大都市都存有租界，可資掩護，為革命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

雖然中部各省的清政府官吏，仍以革命為大逆不道而防制甚嚴；但中部知識分子水準甚高，有的自古代經典中得到蠻夷猾夏的民族精神，對滿清政府從嫌惡發展到反對；有的接受西方民主思想與民族國家的知識，對滿清以極少數民族統治這麼多的漢族，反感甚深。這些因素，都是發展革命運動的良好條件，但是中部地區深藏於我國腹地，對外聯絡，終感不便，發動軍事起義，得到外面援助的機會，比較困難。

所謂外面援助，是指僑胞方面經濟支援與人力支援，因為革命運動之發展，是要靠僑胞的經濟和人力支援的。劉道一以萍鄉、醴陵為基地之起義，曇花一現，未及獲得外援而即告失敗，便以此故。但革命運動，並未忽視中部地區之發展，如上海、漢口都成為革命同志發展革命運動之根據地，便是一例，但就整個的革命策略來說，中部是革命策源地而不是發動起義地區，是顯然可見的。其三，是南方起義計畫，這是最佔勢力的一派。理由是：第一，南方接受西方知識的時間最早，吸收

革命同志最易收效。

第二，南方與僑胞集中地區的東南亞最接近，接受僑胞的援助最便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南方與英國的香港九龍，法國的越南和英國另一殖民地的緬甸交界，可以在這些地區先作革命起義的準備，準備妥善後，突入國內，與國內同志相應合，成功之勝算，比較最高。故廣州起義，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河口起義等都發生在南方，即黃岡起義，亦因與日本台灣總督有聯繫之故。居正之赴仰光辦報，也具有向滇西突襲的意義。這幾次起義，初步都有相當的成功，但對全國而言，發生不了多大影響力。第十次革命，決定於檳城會議，仍以香港為籌備區，而以廣州為起義地區。起義成功以後，以趙聲為一路，由江西而趨江淮，另一路以黃興趨湖南而轉向湖北。故中部地區在



共進會的負責人焦達峯，他是長沙光復後的首任湖南都督。

革命運動中是策應地而非起義地，是有根據的。

三二九之役失敗，黃興經過一段心意灰懶的時間，仍擬前往緬甸，作滇西起義的企圖。他不知道「北爭漢口為長策，此復神州第一功」的，在他的理想中，仍以中部為策應地而非起義地，也很明顯的。

昔三藩之亂，熟知天下大勢的顧祖禹，曾至耿精忠幕，參與反清運動，但是他到了福建以後，一方面看不慣耿精忠不願反清大業而專與鄭經（清政府文件作錦實誤）爭地盤爭兵源，而他方面更認為「福建形勢狹窄，得之不足以震天下」，故廢然而返，得福建尚不足以震天下，何況邊陲地區。

武昌起義，一舉而成功，便是由於得之「足以震天下」之故。故起義地點之適當，是革命運動的重要關鍵之一，是值得我反攻復國中的參考。

組織團結領導問題

三二九黃花崗起義的失敗，心意灰冷者，不止黃興一人，素來對革命運動熱心推展而有革命老人之稱的譚人鳳也是其中之一。譚人鳳原已準備返回湖南原籍，過其隱居生活，以享餘年，但是他到了漢口以後，心意改變了。他看到武漢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之蓬勃朝氣，而且活動都有良好的成果，他又奮發起來了。文學社是由革命知識分子所組成，領導分子如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等都是奮力工作的青年，他們專做軍隊中的工作。所謂軍隊工作，是乘着湖北募訓新軍的機會，派革命同志應募入伍，以他們為醉母，吸收軍中有志青年為同志，那一個部隊中還沒有同志參加，便派人應募，不管他們興趣問題，這種為革命而犧牲的青年，真是令人敬佩。由於他們的努力，湖北新軍中都有同志在努力工作，似滾雪球，越滾越大。不過他們的原則，只吸收士兵同志，不吸收官長，因為官長常是利慾薰心之徒，為了升官發財，可能出賣同志。這一原則，可能是受天地會的影響。共進會是專門做幫會的聯絡工作，負責人是焦達峯、劉公、孫武等，焦達峯是留日學生，本於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不在乎幫會中人為友，幫會就是由台灣天地會傳播到大陸以後的名稱，天地會的基本原則，是不吸收知識分子與官吏，極大部分的幫會分子，都是販夫走卒或碼頭工人之類的粗人，這種粗人倒是頂有義氣，而且對於領導人即所謂大龍頭的命令是絕對服從的。共進會對湘鄂贛和長江一帶的碼頭工人

等，都有密切的聯繫，成效甚著。但是文學社與共進會，各幹各的，互不往來。

譚人鳳看到這種情形，一面興奮，一面認為他們的辦法不準，因此極力拉攏合作，彼此應該互相了解，互相策應，力量才可以加倍的龐大，革命運動才更易於發展。雙方對革命老人的至誠湊合，都很感動，因此互相合作，常常舉行聯合會議，共策進行。

譚人鳳在促成共進、文學兩社團結合後，掉轉船頭，向下遊行駛，一方面考察沿江的革命部署，並加勸勉，一方面到達上海，與滬方同志商組中部同盟會，統一指揮中部的革命運動，他方面更與香港的革命組織聯繫，以通聲氣。武昌



共進會的領導幹部劉公，他被推為革命發難後的總理，負責政治，設籌備處於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

首義，就在這種情勢下進行的。

武昌起義本有完整的計畫和整套的進行步驟。但是臨時事故的發生，使有計畫變成無計畫。有步驟變成無步驟，這中間也有本身的因素，也有外來的因素，外來的因素，就是清政府的鄂方官吏，漸知武漢革命發展已至即將爆發的程度，因將新軍逐漸調離武昌；端方受命赴四川處理鐵路風潮，又帶走了兩營新軍，在武昌的新軍，又將子彈收回，非實習作戰，不會發給，這使武漢同志感到極大的困擾。

內在的因素，就是漢口俄租界區的偶發的爆炸事件。俄租界的同志集合地，本是一個極機密的軍火製造區。有劉公者，襄陽人，曾捐五千元為革命軍費，故黨人咸尊重之。他的寵姬堅決要參觀這個密區，黨人礙於劉公的情面而勉強同意，不料她同去一個什麼人，把烟灰掉在火藥上，一聲爆炸，引起俄租界當局的搜查，因而革命同志在武漢的部署，悉為俄領所知，以之轉告清政府的武漢當局，於是革命機關大多數遭到破壞；武昌的小朝街，本是革命機關的總部所在，亦被搜查。其時重要革命同志正在集會，惟一堪任軍事總指揮的蔣翊武，亦在會議場所，已將作戰命令草就，而緹騎突至，翊武翻牆逃走，同至岳陽的軍次，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均遇害。楊宏勝是在武昌清兵營外，開設一個小酒館專負消息傳遞的聯絡責任。在這樣緊急情況下，只好臨時發

動起義。首先起義地是工程營，發第一槍者為熊秉堃，時間是陰曆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由於他們都是士兵同等階級的志士，所以他們只知道向楚望台搶佔軍火庫，如何指揮前進？都一竅不通。途遇隊官吳兆麟，以生死存亡之，兆麟乃臨時負起指揮責任。時清政府之湖廣總督為滿人瑞澂，軍事負責長官是統制（相當於師長）張彪，協統（相當於旅長）為黎元洪。瑞澂與張彪都是胆小鬼，尤其是張彪，他的統制是鑽營得來的，他是張之洞的丫頭之丈夫，故有「丫姑爺」的雅號。他根本不懂軍事。他們一聞革命軍起義，便慌慌張張的逃到兵艦上去了。黎元洪是海軍出身，他通曉海軍，義軍起事時，召開軍事會議，曉諭他們不可亂動，他知道船在武昌附近的軍艦只要發幾砲，便可夷平武昌。這個軍事會議，直開到天明，所以是一種以柔術來監視他們，雖然幫了清政府的忙，實際上也幫了革命軍的忙，因為這些軍官不一定是革命同志，他們如果抵抗，則革命軍不一定能够順利的佔領總督府。天明，知道瑞澂、張彪已經逃走，總督署已被占領，會議不散而自散，他自己也往鄉間逃難去了。革命軍方面，雖有吳兆麟指揮，但他不過是一個隊官，並無統籌全局的能力。由於黎元洪平日御下寬厚，所以想到由他來擔任統帥，但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也算他鴻運當頭，巡邏士卒發現黎宅有燈火，入門視之，乃是奉黎命搬運幾隻箱子。於是他們跟着黎的家人，找到了他。他聽到有人回來，嚇得躲到床下，被人拖出來，告以意見，黎始勉強同意，被推為都督，故時人稱之為「

床下都督」。三鎮底定，黎宣告就職，他坦白地說：「我前天不是革命黨人，昨天也不是革命黨人，今天才算是的。」這真是洵來的富貴，後來成爲中央大元帥，成爲副總統，袁世凱死後且爲大總統，所以首義的第一個成功者，是原非革命黨人的黎元洪。軍事重地，任何情面，都不能講，這是一個最寶貴的經驗。

漢陽攻防戰略戰術

武昌首義以後，三日內底定三鎮，十二日後湖南起義，九月初十日江西起義，九月十八日安徽起義。這三省起義的成功，鄂省形勢，始告安定。因三省都是湖北的鄰省，湘鄂指臂相連，皖贛與鄂聲氣互通。此後接連起義響應者，半年之內，達二十四省之多，真是一氣呼成，人心大快。

清廷聞武昌起義成功，大爲震恐，特派兵部尚書（陸軍部長）蔭昌南下，赤手空拳，毫無辦法，只好起用已被罷斥而息影滬上的北洋軍首領袁世凱，初任湖廣總督，繼任內閣總理，這是新的官名，效法西方體制，欲以君主立憲以緩和革命軍者，實際上等於引狼入室耳。

蔭昌南下，爲什麼束手無策呢？因爲其時山西已經光復，而革命同志吳祿貞統率的第六鎮，駐防於平漢、正太兩鐵路的交點石家莊（石門市），燕晉已連成一體，北京方面的一兵一卒，一彈一械，休想南下。此外，京東灤州一帶選駐防二十鎮，統制爲張紹曾，也是革命黨人，北京已在這兩部革命軍隊鉗形威脅之下，這是革命軍的最佳形勢。因此，清政府之所



武昌革命起義清廷派兵部大臣蔭昌率領海陸援軍南下打革軍，蔭昌奉命後，赤手空拳無兵可用，束手無策。

以起用袁世凱，乃倡於時勢。袁世凱既被任爲內閣總理，乃暗殺吳祿貞奪取第六鎮的指揮權，繼把張紹曾調走，北方粗安；於是命馮國璋爲第一軍總司令，段祺瑞爲第二軍總司令，各統兩師北洋軍，由平漢鐵路長趨南下，首先攻取漢口，因而發生陽夏保衛戰的嚴重問題。革命軍既失漢口，保障漢陽的安全是第一要務，黃興在港，本有赴緬甸的打算，及聞武昌起義成功，乃兼程北上。首至上海，在張竹君的紅十字

會救護隊中扮作工人模樣，混至武昌，武昌聞黃興至，萬人空巷的迎接他，他們都手執黃興到的牌子，來歡迎這位革命軍事家，其聲勢之壯，可謂空前。黃興到了武昌，與各方面略作磋商後，立即轉赴漢陽前線督師，負起保衛漢陽的大責任，但是黃興雖然盡了他全部的能力，結果未能達成任務，給三鎮人士以重大的失望。作者在此要討論的就是黃興的軍事策略問題。

黃興之所以以軍事家著稱於革命軍中者，是他在十萬大山中輾轉與清軍打了四個月的仗的戰績，因而得「國父當衆的稱許。黃興於十萬大山中的戰果，因此一到漢陽，便作收復漢口的軍事行動。事實上他犯了昧於知己而不知彼的大錯誤。在十萬大山中，他所遇到的是清政府在邊區的地方軍或作戰能力極低的舊日的巡防軍；而當面之敵，乃北洋軍的精銳，裝備好，火力強，而其指揮官馮國璋與段祺瑞也都具有相當指揮能力的北洋名將。他們所率的部隊達四師之衆，而黃興所能指揮的只有四個旅，都是湘鄂兩省新招的或舊巡防營改編的，作戰力與火力，都較北洋軍差距相當大。兵法有云：「五則攻之，十則圍之」革命軍常常以少勝多，這一原則，當不必顧慮，但在這樣對比之下，黃興只能憑漢水之險，以禦敵軍，爭取時間，等候各省援軍之到達，然後相機進攻，消滅敵軍，方爲良策。我們必須理解，北洋軍所恃的是「力」，革命軍所恃者是「勢」。保清的北洋軍是無理的力，無理之力，必爲國民唾棄而摧折。各省響應，紛紛援軍前來陽夏前線，這就是革命的勢，革命是順天應人的大

業，以這樣的勢，來對抗無理的力，勝利如操左券，而克強先生不等待各省援軍的到達，而選擇攻勢，這是他昧於大勢的觀察。

不僅如此，他在戰術的措施，也犯了大錯誤

。渡河作戰，必須渡河工具，這是絕對沒有錯，但是他的建造渡河工具，是在漢水的琴塘口，連船為橋，這是不能秘密的行動，正好給敵人以集中掃射的機會，這便大錯特錯了。他是秀才出身的半調子軍人，大概連我國的戰史都讀得不多。

秦既滅亡，劉邦項羽是當時互爭雄長的對敵。在韓信還定三秦以後，所部都被劉邦帶走，直接進攻項羽首都彭城，只留老弱殘兵，要責成他取黃

河以東現今山西省的魏豹所部，魏豹軍有二十多萬之衆，這是一個大難題，但是韓信終能達成任務，其巧妙便在渡河的運用。秦晉之間黃河最重要

的渡口是臨晉，魏豹防守甚嚴。韓信陳兵作攻擊臨晉狀，魏豹乃悉力守之。但韓信實際上的渡口是夏陽，而且以木壘作渡河工具，完全瞞過了

魏豹的注意力。及渡河完成，揮軍擊魏豹之後，有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魏軍因而大亂，韓信遂

大獲勝利。故以少數部隊，對敵作渡河戰，非有巧妙的運用，無法達成任務的。克強先生則不然

，由琴塘口築橋，即由琴塘口揮軍渡河，北洋軍早在左右擺設陣地，掃射革命軍，故第一旅革命軍幾乎全部消滅，其後退者，黃興與學生軍親自舉槍彈壓，亦不能阻止。再調另一旅渡河，這一旅

不但不能渡河，而且轉向後方，回湖南去了。於是黃興保衛漢陽的兵力，由四旅而減為兩旅，但仍能堅守月餘。李烈鈞以安徽部隊西援陽夏，正

擬襲擊北洋軍後路重鎮平漢路花園站，但軍行未至目的地而漢陽已失守，不得不返回原防，其他各省之援軍，也是如此。克強先生漢陽保衛戰之失策，由此可知。

根據後來担任江蘇都督的莊蘊寬之考察記載，漢口反攻之不能成功，還引起湘鄂軍之摩擦。鄂軍有武昌首義的成功記錄，傲慢不可一世，漢陽保衛之希望，寄託黃興之指揮，但其戰績也不過如此。

因此，漢陽前線，向武昌要兵，武昌不發兵

編輯報告

編者

△皮宗政將軍，歷任三軍大學校長，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兼教務長，星加坡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教授兼研究所長，桃李滿天下，十年前曾為本誌撰寫他在英國皇家軍校受訓的經過，極受讀者歡迎。皮教授為紀念

蔣介石九六誕辰，特就他民國卅一年至三十六年在侍從室追隨蔣公期間親見蔣公與盟軍將領史迪威、赫爾利、馬歇爾、魏德邁、魏亞特、奧德隆、浦立德等相處所表現的偉大的人格與風範，許多聞所未聞的軼事，出現在皮教授的筆下，既富史料價值，尤具教育意義，讀來令人肅然起敬。

△民國七十一年之雙十國慶即將到來，海內外同胞歡欣鼓舞，慶祝勝況自不待言，

要錢要餉，武昌不發錢，不濟餉，漢陽保衛戰之不能持續更久，雙方之由合而乖，亦為主要因素之一。

這一經過給我們的啓示，是革命運動，必須要堅強的團結，彼此要有堅決的互信，指揮官要有高度的智慧，更須具有判斷敵情與善用己長，善制敵短的能耐。德國納粹，在發動戰爭之前，訓練全能的指揮官，所得不過五十餘人而已。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在反攻復國的準備期間，所應注意參考的重要資料。(下期續完)

本誌特請史學家蔣君章教授撰為「武昌首義五大檢討」，蔣教授的大作，立論精闢，識見超卓，和一般應景的文章大不相同，值得細讀。

△郭岐將軍的「黃沙碧血戰新疆」本期寫到他在天山北麓烏蘇城西北叛軍佔領區，冒險向東晝伏夜行的艱辛歷程，曲折離奇，緊張刺激。抗戰勝利前後，國軍將士為保衛西北國土，與敵人鬥爭，可歌可泣的事蹟，讀來有盪氣迴腸之感。

△范興國先生「西點軍校發展史」因排校不及，將延至下期與江濤教授、閔湘帆先生、陳士誠教授、阮壽榮先生、龔維荃先生等的作品一同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中 外 雜 誌 (頁八第見文) 圖 插 「 討 檢 大 五 義 首 昌 武 」 章 君 蔣

清廷調湖南軍隊鎮壓四川保路風潮，使華中清軍兵力薄弱，給革命軍起義機會。圖為端方（中坐者）偕張彪（左三）入川查辦鐵路風潮圖照。



(三右排前) 爾 戈 泰 人 詩 度 印 與 (二右排前) 摩 志 徐 人 詩 名 的 瀟 瀟 態 儀 甲 馬 袍 長 襲 一
(爾 戈 泰 人 詩 頁 七 十 三 及 「 感 述 事 往 」 潔 李 頁 〇 一 一 見 文) 影 合